

由兒童權利公約檢視臺灣現行收養制度

邱靖惠・白麗芳・許愷洋

壹、前言

兒童福利聯盟於 1992 年開始辦理收出養業務，25 年來倡議與見證了臺灣收出養制度各項變革。

早期臺灣收養未有明確制度，私下收養、販嬰層出不窮，兒童基本權益未受保障。到 1985 年民法修正「收養子女應申請法院認可」，司法體系首度介入，但法官僅參酌收養人的消極資格，而非實質審酌兒童最佳利益。直至 1992 年兒童福利法修正通過「出生通報制度」，以及法院收養案件需參考社政單位的訪視調查報告；2003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納入調查出養之必要性與成立收養資訊中心要性；2011 年通過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範定收出養媒合業務需由專業機構執行，與收養媒合以國內為優先等。此一連串的修法變革，除了減少販嬰或規避法院調查的非法收養案件外，亦是希冀收養制度能落實兒童的最佳利益。

2014 年我國正式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確立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具有國

內法律的效力，承諾臺灣兒童人權正式與國際接軌，並著手撰寫兒少權利報告（國家報告）、檢視法規有無違背兒童權利公約等工作。其中兒童權利公約本文第 21 條即針對收養提出規範與建議，顯見收養服務與兒童權益息息相關，收養兒童權利應受到政策法令的保障。

有鑒於此，本文的目的主要在探討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攸關收養服務之相關規範與內涵為何；並關注現行法令制度落實公約精神之現況；最後，兒盟身為提供收出養服務之民間機構，從第一線實務的角度對我國收養服務現況提出一些觀察與建議。

貳、兒童權利公約與收養有關條文說明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一向強調家庭對兒童的重要性，而在特殊情況下，倘若兒童無法在其原生家庭環境中成長時，政府有責任義務安排其他替代性照顧，而收養即是其中一種。

公約中對於「收養」一詞無統一定義，不同國家、文化會發展出不同形式，但大致是指「使個人能取得如同血緣關係之親屬關係的社會及法律習慣，且該親屬關係全部或部分優先於原血緣關係」（Andre Alen et al. eds., 2008；引自高玉泉，2016：187）。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 21 條收養

在兒童權利公約主文當中，於收養有關的主要係第 21 條，條文說明締約國承認及（或）允許收養制度者，應確保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最大考量，並應：

（a）確保兒童之收養僅得由主管機關許可。該機關應依據適用之法律及程序，並根據所有相關且可靠之資訊，據以判定基於兒童與其父母、親屬及法定監護人之情況，認可該收養，且如為必要，認為該等諮詢可能有必要時，應取得關係人經過充分瞭解而對該收養所表示之同意後，方得認可該收養關係；

（b）在無法為兒童安排寄養或收養家庭，或無法在其出生國給予適當照顧時，承認跨國境收養為照顧兒童之一個替代辦法；

（c）確保跨國境收養的兒童，享有與在國內被收養的兒童相當之保障及標準；

（d）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跨國境收養之安排，不致使所涉之人士獲得不正當的財務上收益；

（e）於適當情況下，締結雙邊或多邊協議或協定以促進本條之目的，並在此一架構下，努力確保由主管機關或機構負責安

排兒童於他國之收養事宜。

本條文一開始開宗明義強調收養過程中「兒童最佳利益」係為「最大考量」（the paramount consideration），相較於條文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a primary consideration），在此「最大考量」意謂在收養事件中，其他任何利益（不論經濟、政治、社會安全或收養者之利益）皆無法相當、或優先於兒童最佳利益之考量（Hodgkin & Newell, Unicef, 2007, P.295；引自林沛君，2015：101）。

本條文第 a 款第一句揭示收養決定不只由生父母或是養父母決定，而是需要經過「主管機關許可」，因此兒童權利委員會建議締約國要迅速採取措施阻止所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的收養。

此外，第 a 款有關「根據所有相關且可靠之資訊，據以判定基於兒童與其父母、親屬及法定監護人之情況」依據 UNICEF Implementation Handbook 說明，主管機關在判斷每一件收養事件，都必須是根據「由獨立專業人員進行調查後所提出之完整報告」，並針對該名出養兒童與其出養家庭的心理、醫學、社會、法律等不同層面進行分析，應包括以下內容：（Sylvain Vité, Hervé Boéchat, supra note 1, at 32；引自高玉泉，2016：192）

出養兒童及其生父母與大家庭的身分：

1. 出養兒童的成長歷程、個人與家庭史、族群與宗教背景；
2. 出養兒童與原生家庭之關係以及出

養的原因；

3.出養兒童的身體、動作、智能、社會情緒發展；

4.出養兒童的外表、個性與行為；

5.出養兒童的現況，包括：生活習慣、獨立的能力、與身邊其他兒童與成人的關係等。

第 a 款亦提及「應取得關係人經過充分瞭解而對該收養所表示之同意後，方得認可該收養關係」，此段文字雖未明確指出哪些特定人士之同意為必要，但須注意、確保相關程序有無侵害出養兒童或其父母之權益；而且儘管出養兒童之同意不是收養的要件，但考量兒童之想法為其最佳利益的核心，因此在收養事件上隱含必須充分考慮兒童想法之意涵，（Hodgkin & Newell, Unicef, 2007, P.296；引自林沛君，2015：102）。兒童權利委員會就曾建議個別國家是否確實有考量出養兒童的想法，特別是有一定年齡以上的兒童，應取得該名兒童之同意（New Zealand CRC/C/15/A.216, para.34）；此外，委員會亦強調關係人表示同意後，應有撤回的可能，而且撤回期間不得過短（Hungary CRC/C/HUN/CO/2）。

本條文第 b 款至第 e 款，則是規範跨國收養。強調是在「無法為兒童安排寄養或收養家庭，或無法在其出生國給予適當照顧時」，即窮盡國內收養的各種途徑後，才允許跨國收養。第 c 款則補充說明即便是跨國收養的兒童亦應享有與國內收養（第 a 款）一樣的保障與標準。第 d 款則是規範費用的部分，僅限於合理的專業人

員費用及支出，以避免有心人士在跨國收養中獲得不當利益。最後的第 e 款提及「締結雙邊或多邊協議或協定以促進本條之目的」，指的是海牙跨國收養公約，希望各國透過協定或其他模式合作跨國收養。

除條文本身規範外，參考 UNICEF Implementation Handbook 所提出之特定議題落實清單（Hodgkin & Newell, Unicef, 2007. pp.301-302；引自林沛君，2014：103-104），另補充收養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如下：

1.相關法令是否明確要求被收養兒童之最佳利益應為「最大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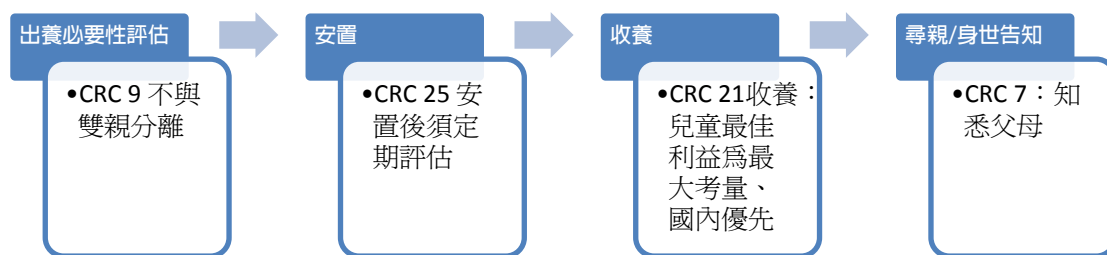
2.針對收養事件中的兒童最佳利益之評估，是否確實是以完整資料為判斷基礎？

3.收養決定是否充分考量被收養兒童之意見？是否視其年齡與成熟度給予適當權重？除被收養兒童外，其他相關兒童（如收養家庭子女）最佳利益是否納入考量？

4.跨國收養之法律規範是否符合次順位原則？

二、其他兒童權利公約與收養有關條文

除了第 21 條外，由於收養係一個動態之服務過程，從決定出養到確認收養，中間歷經兒童出養必要性之評估，確認出養後進行安置，以及被收養兒童後續的尋親與身世告知等，此一連串的服務流程依序尚牽涉到兒童權利公約第九、二十五、二十一、七條，說明如下：



註：以上四階段皆須考量兒童最佳利益、兒童參與表意權

圖 1 兒童權利公約（CRC）與收出養服務流程圖

基於兒童權利公約第九條條文「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顯示不與雙親分離係一重要的兒童權利，國家有義務採取積極的措施以及提供適當資源，避免父母因為「不必要」因素而親子分離，而所謂「不必要」的情況，依據 UNICEF 整理兒童權利委員會歷年來意見，包括：因經濟困難、居無定所而強制安置兒童，或是因貧窮、暴力導致兒童逃家或遭遺棄之情況。遇到上述情況，國家應先行提供支持性服務以避免兒童與家庭分離，或協助其重返家庭（Hodgkin & Newell, Unicef, 2007. pp.123-127；引自林沛君，2015：51）。因此針對出養兒童是否已窮盡一切對其家庭的支持，仍無法讓孩子繼續留在原生家庭，而必須另覓收養家庭，是出養必要性評估之重點。

評估出養必要性後，一旦確定要出養，通常會協助將兒童先行安置。在安置過程中，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五條條文強調，「締約國確認為照顧、保護或治療兒童身體或心理健康之目的，而由權責單位安置之兒童，有權對於其所受之待遇，以及

所受安置有關之其他一切情況，要求定期評估。」兒童委員會強調在安置決策過程中傾聽兒童意見之重要性，並且必須監督安置期間兒童所得到的待遇，監督的次數以及間隔期間係屬各國裁量範圍，但基本原則為「越具強制性的安置之監督、評估次數應越為頻繁」。一旦兒童接受安置之後，就應該針對安置的決策進行後續追蹤，追蹤應考量兒童的處遇模式是否適當、是否需要繼續安置、兒童的想法等（Hodgkin & Newell, Unicef, 2007. pp.383-384；引自林沛君，2015：119-120）。安置期間過長，不僅會讓孩子長期處於不確定的照顧環境中，在臺灣，倘若在安置機構停留太久，出養兒童隨著年紀增長，國內收養的可能性愈低，將嚴重影響其權益，因此安置後的定期評估與追蹤相當重要。

所有兒童皆擁有了解其身世之權利，誠如兒童權利公約第七條所規範，「兒童於出生後應立即被登記，…，並於儘可能的範圍內有知其父母並受父母照顧的權利」。即便是離開原生家庭被收養後，兒童同樣亦有知悉其生父母與原生家庭之權

利，後續身世告知、尋親的法律規範是否符合公約本條文的要求，前開權利之限制是否僅限於如揭露該等資料可能會對兒童或其父母造成傷害（Hodgkin & Newell, Unicef, 2007. pp.110-111；引自林沛君，2015：46）。在此值得探討的是，被收養兒童的相關身世資料是否確實被保存，以及他們是否擁有查詢該資料之權利。

參、CRC 與臺灣收養立法

公約第 21 條條文其中一段「該機關應依據適用之法律及程序」，明確指出締約國有義務訂定並落實收養法規與程序。在我國《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條約專要文件》中，提及與收養服務有關的立法制度與措施主要在《民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法》），及其子法《兒童及少年收出養媒合服務者許可及管理辦法》（下稱《收出養媒合管理辦法》）當中，底下就一般國內收養與跨國收養分述如下。

一、國內收養

依《民法》第 1079 條規定：「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目前我國對於收養採取認可制度，法院認可成為收養之生效要件。而法院認可兒少收養時，得命家事調查官、主管機關或兒少福利機構等進行訪視，提出報告及建議。亦可命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共同生活一定時間，或命收養

人接受親職準備教育、精神鑑定或藥、酒癮檢測等必要事項。認可或駁回聲請之裁定，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俾利主管機關為必要之訪視或其他處置。除須符合前開《民法》規定外，依《兒少法》第 16 條、第 17 條規定，除繼親或一定親屬間收養外，無血緣的收養都必須透過機構媒合（目前有 9 家機構，計 13 處服務單位），欲收出養之民眾皆須向合法收出養機構提出申請，經過社工的訪視調查與評估，收養人尚需接受親職準備教育課程，審查通過後經過媒親和試行同住，機構會提交評估報告給法院，作為裁定之重要依據。

現行制度規定收養必須透過法院認可，並通知當地主管機關，以利後須追蹤，而法院判決依據則是參考家事官或社會福利等專業人員所提供之報告。上述收養立法與服務措施大致依循公約對收養的規範與精神——收養僅由主管機關許可，並且是根據所有相關且可靠的資訊。而在「關係人充分了解並表示同意」的部分，則是有《家事事件法》第 108 條說明，法院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給予充分的表意權。

二、跨國收養

跨國收養的部分，目前我國有 5 家媒合服務機構，與 11 個國家超過 32 個團體合作辦理跨國收養服務。

依《兒少法》第 16 條規定，以國內優先收養為原則。而《收出養媒合管理辦法》第 21 條亦規定，媒合服務者辦理跨國境收養時，應提供已進行國內優先收養之證明

文件。並且建置「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資訊系統」，使各媒合服務者可共享被出養兒少資訊，增加國內收養機會並縮短等待期間。而且依《兒少法》及《收出養媒合管理辦法》規定，兒少之國內出養及跨國出養服務流程、審查標準、所受服務及權益保障皆相同。充分說明跨國收養的次順位原則以及符合國內收養兒童相同的保障與標準。

《收出養媒合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申請從事跨國境收出養媒合服務許可應檢附他國合作單位受該國認可或授權之證明文件，並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審查，確保收養行為符合各該國之規定。該法第 19 條規定媒合服務者收費項目及基準，並透過業務檢查及評鑑，加強監督機構收費用途，避免媒合服務者巧立名目收費或收取超額費用。在此規定下，可預防跨國收養不致使涉入人士獲得不當利益，並確保出養兒童於他國能獲得符合其最佳利益的安排。

無論是《民法》或是《兒少法》，在近

幾年國內保障兒少權益思想脈絡下，收出養各項法規已漸趨於完善與成熟。

參、服務現況與爭議

一、服務現況

根據司法院統計，2015 年法院裁定收養兒少人數有 1,584 人，就收養類型進一步區分，以繼親與一定親屬間收養比例最高，合計占了近八成左右。本會服務經驗發現又以繼親收養為大宗，繼親收養亦稱他方收養，指收養配偶前次婚姻或前段感情所出的孩子。而一定親屬間收養，係指收養人、出養人及被收養人間有血緣關係，可能基於協助有困難的親人照顧孩子、傳宗接代等原因而辦理，須符合《民法》與《兒少法》之親等輩份規定。

然而現行法規相對嚴謹的是指無血緣關係的收養，其實僅占兩成不到的比例，一年大約三百案左右，且跨國出養比例比國內出養要高。

表 1 法院裁定收養兒少人數－依收養類型區分

	總計	繼親或一定親屬間收養	無血緣關係收養（收出養機構媒合）		
		小計	小計	國內出養	跨國出養
2013 年	1651	1385（83.9%）	266（16.1%）	100	166
2014 年	1611	1264（78.5%）	347（21.5%）	155	192
2015 年	1584	1283（81%）	301（19%）	143	158

註：收出養新制 2012 年 5 月 30 日施行，故引用 2013 年以後之數據

資料來源：司法院、衛生福利部

二、現行爭議

然而每年平均有上千位被收養的兒少，是否皆有符合法令規定或是兒權公約

之精神，以下分別就收養前期之出養必要性訪視評估、安置期間，至收養兒童最佳利益、表意參與、跨國出養次順位原則，以及收養後期的身世告知與尋親服務，種種遭遇之問題與困境逐一說明如下：

(一) 政府對出養家庭之支持與提供資源不足

兒權公約 21 條第 a 款強調判定出養兒童、其父母家庭狀況，必須依據相關且可靠之資訊，而家庭出養原因即是其中一項。基於 CRC「兒童不與雙親分離之權利」，針對要出養兒童之家庭，政府應窮盡所有家庭支持服務或提供足夠育兒資源，以減少「不必要」之出養。然就本會服務出養家庭經驗發現，許多出養人得不到家人支持，但又因家人有資產或工作，無法通過政府補助審核，在社工員無法連結長期穩定資源下，生父母只能選擇出養。

而目前全國收養案件有八成係屬繼親或一定親屬間收養，其中又以繼親收養為大宗，實務上不乏因為父母再婚，期透過繼親收養來切斷孩子與前配偶之間的法定關係，讓對方無法再探視孩子；另外繼親婚姻一旦結束，往往也會伴隨終止收養。目前繼親收養的訪視次數多半僅為一、兩次，是否有確實讓前配偶充分理解出養後所造成之影響，切斷與原生父母之關係是否符合兒童之最佳利益。

(二) 安置處遇期程漫長，未落實執行期限

確認出養必要性而進入安置系統的出養兒童，有時會因為行政疏失而無法順利

被收養。雖然《兒少法》第 65 條，明文規定安置兩年以上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其家庭功能不全或無法返家者，應提出長期輔導計畫。此外，《民法》第 1090 條及《兒少法》第 71 條之規定，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法院得依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

即便有法律明文規定，但實際執行仍曠日耗時。依據本會經驗，有些出養兒童被安置超過 4-5 年，才被提到停止親權評估會議討論，之後還須經歷停止親權及等待出養一連串程序，包含尋求律師協助、法院送件、等待停親判決、轉介收出養機構及等待媒合，而上述所提及之程序，迫使出養孩童必須再繼續耗費 1-2 年的時間待在寄養家庭或育幼院，進而錯失最佳出養國內的時機。

兒權公約第 25 條強調受安置兒童須接受定期評估與追蹤，即是確保兒童之權益不會在安置過程中犧牲。無論是安置期限或是親權停止判決確定未落實行政流程執行時限，此行政流程上之消極不作為，過長的程序作業時間，嚴重影響兒少權益。

(三) 兒童最佳利益僅為次要考量

兒權公約第 21 條強調，兒童最佳利益為收養最大考量，其他政治、經濟、收養人利益等絕對不能等同或大於之。但因兒

童是權力較為弱勢的一方，無法為自己權益發聲，當欲申請收養的成人受阻時，就會向民意代表陳情或政府部門施壓，而政府主管機關就會邀請收出養機構和縣市政府商討如何回應欲收養孩子民眾之需求。臺灣收養制度過往是從為宗嗣與為父母所發展出來，社會大眾習慣用成人角度思考，認為只要具備愛心和經濟能力即可收養，無法認同現行以兒童為本之收養制度，比如：收養父母需與被收養人有一定年齡差距、需經過機構審查評估、或是無法自己挑選投緣的孩子等。

此外，「兒童最佳利益」本身即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實務執行上仍有些爭議。遇上不同專業領域，亦會做出不同的判斷與解讀，特別是跨向法律領域時，最佳利益見解並非一致。比如《兒少法》第 18 條父母對於兒童及少年出養意見不一致，或一方所在不明時，經法院調查如果認為收養符合兒童最佳利益，應予認可。但實務上如果父母一方反對，即便過往沒有實際照顧過孩子，法院可能還是會尊重父母的意見，讓孩子持續留在安置系統；另外，根據社家署兒少收養資訊中心統計，每年兒童被終止收養案件當中約有四成五來自於繼親收養，成人間一旦離婚就立刻辦理終止收養，並未以建立親子關係為收養之目的，因此社工訪視調查報告建議希望親子間要有一段實際相處的時間後再來申請收養，但法院不一定會採納社工的見解。對於親權和兒童最佳利益的權衡，司法和社工的解讀顯然還有一定之差距。

(四) 缺乏友善環境協助兒少參與表意

公約第 21 條雖未明確指出需要出養兒童之同意，但兒童參與表意是 CRC 四大原則之一，顯見兒童想法應被充分考量。我國《家事事件法》明文收出養孩童表意權及曉諭裁判結果之權利，然根據本會實務經驗，法庭內高壓氛圍仍讓兒童在表意過程中感到不自在。

由於我國司法體系本身未建構出兒童表意的友善環境，實務上有司法事務官因不夠了解兒童發展，用較艱澀之字眼或命令口吻，要求孩子當庭表示意見；或者未考量兒少感受，在孩子面前盤問出養人複雜之交友狀況或犯罪背景；亦曾有養父母因不願使其七歲以上子女得知收養身世，請託事務官不要傳孩子出庭，事務官竟然同意之案例等。此外，法庭上對下的位置和環境，使未成年當事人在表意過程中感到諸多壓力甚至恐懼。因此在法律程序中，如何落實建構一種更為平等且友善的兒少參與表意環境，係當務之急。

(五) 跨國境收養前是否窮盡國內可行的安置而不可得

2015 年透過機構收養的案件中，國內有 143 位、國外則是有 158 位，雖然跨國境與國內收養之差距逐年拉進，然每年仍有百件，目前我國跨國收養是否有符合次順位原則，值得探討。

雖然政府設置媒合平臺，並規定四十五日未媒合成功，才可跨國境出養。但各收出養機構媒合習慣、細部處理流程與價

值理念尚有差異，如：有些機構仍以跨國出養為服務大宗，因此導致媒合平臺只徒具形式，成效相當有限。而且政府雖已確立國內出養為優先原則，但該指標內涵抽象，未能實際落實在機構執行層面，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涵。

除此之外，有些特殊出養兒童（罹患疾病）在國內無法尋覓合適收養家庭而被迫出養國外，我國現行福利措施無法提供其足夠協助，此狀況同樣值得深思。

(六) 身世告知與尋親受限現有資訊與查詢權限

目前尋親服務主要係透過兒童及少年收出養資訊中心協助，然受限十一年前才設立，當時各單位並未妥善或長期保存資料，因此十一年前的收出養資料付之闕如。而成立後各單位雖送交資料，但是否全部繳交、無一遺漏無法得知，各縣市政府、收出養機構法院交查案件訪視單位送交資料的積極度也落差甚大。

資料遺漏增加尋親難度，再加上個資法通過後，各方解讀不同，能供查詢的資料更是受到限制，特別是無法申請取得原生家庭戶籍資料，影響被收養人之尋親權益甚鉅。

此外，國外法令多規定滿 18 歲即視為成年，便可進行尋親，且國外常有未成年時即由養父母代為提出尋親申請，而我國法令規定為滿 20 歲才成年，且國內對於身世告知相對保守的情況下，都讓這些孩子無法得知自己的身世。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兒童最佳利益是最大考量，其他利益不得優先或是等同被收養人之利益，係兒權公約第 21 條最重要之精神。要全面調整過去以成人為本位之思考，政府應對社會大眾和民意代表進行觀念宣導與倡議，針對不同專業進行教育訓練，在制度上的設計因為要保障被收養兒少的權益，因此欲申請收出養的成人勢必有些不便，無論從支持孩子在原生家庭中成長、無法返家需要及時安排出養、盡可能讓孩子留在原生國以及給予孩子知道身世和尋親的權利等，每個環節都要回到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認可這是每位被收養兒童的基本人權。

二、建議

(一) 收出養相關制度之建議

針對出養之必要性，因政府對出養家庭的協助與支持不足，社工員訪視時無法連結相關資源，致使此類家庭「不必要」出養兒童，此舉與公約中兒童不與雙親分離權利有所違背。建議政府應全面檢視現行社會救助系統，是否能協助有意願撫養子女之生父母，特別是育有特殊需求兒童之家庭。

此外，為有效促進國內收養，符合跨國境出養次順位之原則，針對現有收出養媒合平臺，本會建議各機構登錄於資訊系統之個案資料內容應具一致性，才可充份

透過資訊系統了解相關訊息。並建議主管機關每年應定期審核收出養機構服務數據，以及跨國境出養兒童之背景資料，如：有無特殊疾病、身心障礙等，進行分析與控管。

(二) 收出養實務落實之建議

在實務層面，為避免孩童長期在安置系統被遺忘，地方政府應落實安置兩年後確實擬定長期處遇計畫，中央政府應定期監督各縣市之執行狀況，並加強對行政與司法體系之溝通，讓需要被出養而兒童的時間不要浪費在無謂的流程當中。

此外，在 CRC 促進兒童表意與參與的

原則下，應在法律程序中落實建構出更為平等友善的兒少表意環境，以讓案件中的兒少當事人能真實表達自身的感受。例如多採用非法庭的情境，援引社工或心理師之專業協助陪同訊問；或是提供司法人員兒童權利議題之相關進修課程，以藉此保障收出養孩童在過程中的基本表意權。

（本文作者：邱靖惠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研發處組長；白麗芳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處長；許愷洋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研發處研究員）

關鍵詞：兒童權利公約、收養、兒童最佳利益、兒童參與表意

📖 參考文獻

- 林沛君（2015）。《兒少人權向前行》臺北市，臺灣展翅協會，2015 年 4 月。
- 高玉泉、蔡沛倫編著（2016）。《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逐條要義》，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
- 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2016）。《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條約專要文件》。取自 https://crc.sfaa.gov.tw/show_doc_area.php?location=B02&loc2=149
- Rachel Hodgkin and Peter Newell (2007). *Implementation Handbook for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Fully Revised Third Edition*. UNICEF. New York: UNICEF.
- SYLVAIN VITÉ & HERVÉ BOÉCHAT, A COMMENTARY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RTICLE 21. ADOPTION 19 (André Alen et al. eds., 2008).
-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Hungary, ¶ 34, U.N. Doc. CRC/C/HUN/CO/2 (Mar. 17, 2006).